

修辞学视角下探析《红字》中的人物的说服力效果

薛璇子

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劝说诉诸有助于理解《红字》中人物的语言艺术, 洞悉霍桑笔下人物形象的多重意蕴, 折射作家对于人性复杂性、清教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和专制的反思。人格诉诸有效提升说话人的权威性, 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情感诉诸有助于缩短说话人与听话人心理距离, 引发听众的共鸣; 逻辑诉诸有利于说话人迎合听话人的心理预期, 赢得听众的信任。三种劝说诉诸的交互作用可以有效地提高说话人说服力效果, 同时听话人的接受心理对说服力效果起着特定的制约作用。霍桑将修辞三诉诸作为丰富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策略, 拓展对人物形象构建, 管窥作家高超的艺术表达和对人性的洞察。

关键词: 对话; 劝说诉诸; 说服力效果; 接受心理

Exploring the Persuasive Effect of Characters in *The Scarlet Letter* from a Rhetoric Perspective

Xuanzi Xu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Persuasion and appea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r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carlet Letter*, gain insight into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characters in Hawthorne's works, and reflect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the Puritanism's confinement of human nature, and authoritarianism. Personality appeal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authority of the speaker and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emotional appeal helps to shorten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triggering resonance with the audience; logic appeal is beneficial for the speaker to cater to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of the listener and win the trust of the audience.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persuasion appeal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suasive effect of the speaker, while the listener's acceptance psychology plays a specific restrictive role in the persuasive effect. Hawthorne used the three appeals of rhetoric as a strategy to enric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glimpse the writer's superb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Keywords: dialogue; persuade and appeal to; persuasive effect; acceptance psychology

1 引言

《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是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最杰出的代表作。霍桑凭借其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 大胆的象征手法, 极其深刻的道德预言, 使《红字》自问世以来就颇受评论界的关注。现有研究大多从女权主义、象征主义、伦理批评等角度就小说主题、象征、人物形象评价该小说。而关于霍桑修辞风格的文献或聚焦在其散文作品中, 或仅专注于小说的修辞特征和文体风格, 却忽视了修辞策略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修辞关键在于寻求合适的劝说手段^[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将劝说手段归纳为三种策略: 人格诉诸(ethos)、情感诉诸(pathos)以及逻辑诉诸(logos)。在亚里士多德修辞三诉诸的光照下, 认为霍桑通过将这三种修辞策略用于《红字》中的人物塑造, 凸显并强化笔下人物的多重意蕴的以及对清教主义思想的批判, 拓展修辞学外延, 为小说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 人格诉诸, 说服效果

人格诉诸(ethos)是指说话人本人的可信度, 取决于说话人的人格品质。在《红字》中, 霍桑借助他人之口、言说人外在形象以及对比手段将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塑造成一名年轻有为, 富有学识, 又十分虔诚的牧师形象。他的正面形象有利于提升自己的说服力, 更容易获得劝说效果, 赢得清教官员和民众的认可, 从而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

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 丁梅斯代尔在小说的第三章才首次登场。在这之前, 霍桑通过德高望重的牧师威尔逊(John Wilson)之口, 让读者了解到他曾就读于英国一所著名大学, 学识渊博, 积极投身于教会事务, 深得地方官员的赏识。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声誉, 为丁梅斯代尔人格魅力, 增加其所言之可信度。不仅如此, 他本人仪表堂堂, 声音丰润且深沉, 极富感染力。丁梅斯代尔作为年轻有为的牧师, 这样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有助于他给听众留下良好的人格印象。公众越是肯定他的权威, 就越容易接受权威人格的支配, 越

容易说服,接受说话人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而说话人的根本目的就是引诱他的听众顺从他的建议。丁梅斯代尔的正向形象有利于提升自己的说服力赢得听众对自己所讲内容的认可度,这与其享有的宗教地位相映照,增加人物形象的可信度。

在布道过程中,丁梅斯代尔善于利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加强自己的表述力,增加自己的人格魅力。他站在圣坛之上,俯视台下的听众。“圣坛之上”和“圣坛之下”,不同的地理位置也体现了布道者与听到者的不平等地位,彰显牧师的权威性和优越性。丁梅斯代尔在布道过程中“俯视”他的听众,缩短和听众之间的距离,及时调整自己的布道内容和方式,更有效地引发听众的共鸣。布道者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也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肢体语言。甘柏兹指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语言韵律来传情达意,如语调、声音的停顿、加减速等^[2]。在布道过程中,丁梅斯代尔以忽高忽低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上帝的渴慕,又好比是“饱受苦难者发出的低吟和哀嚎,触动每个听众内心的情愫”^[3]。他的声音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回沉郁,极具个人魅力。

此外,霍桑还借助齐灵沃斯(Roger Chilling worth)这一形象,与丁梅斯代尔形成具有互补意义的文学形象的塑造,突显丁梅斯代尔在说服力上的明显优势,借以讽刺美国早期殖民地宗教一权力的畸形分布。齐灵沃斯身材矮小,年老体弱,身体畸形。虽然齐灵沃斯学识渊博,医术高明,但在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宗教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法律具备同等效力和权威性,所以无论是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上,齐灵沃斯都远不及丁梅斯代尔。他高度怀疑丁梅斯代尔牧师就是妻子的秘密情人,但同时也深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难以取信于民,于是他借助和丁梅斯代尔一起居住的机会,不断从言语对其“刺探”,反复强调人心中隐匿的罪,以此折磨牧师。这些不光彩的行为,恰恰反映了他内心对于自己身份地位的不自信。在他看来,只有拿到牧师通奸的确切证据,才能弥补自己社会地位的缺陷,提高自己的说服力和公信度,让公众相信并接受牧师通奸的事实。

人格诉诸正是借助说话人的身份、专业知识以及外表的突出优势,吸引听众,借以提高自己的说服力,获得更好的劝说效果。丁梅斯代尔积极的正面公众形象与齐灵沃斯消极反面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霍桑尖锐地指出身份地位以及外在形象对公众的欺骗性和愚弄性。同时,这两位人物外在表象与最终各自罪恶的揭露之间形成的张力,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独具特色。

3 情感诉诸说服效果

情感诉诸(pathos)主要指说话人能够有效把握听话人的心理,赢得听众的接纳从而更为有效地说服听众。激发情感的关键在于要激发这种情感与承载它的价值观的某种事

物挂上钩。^[4]在《红字》中,霍桑笔下的丁梅斯代尔利用清教徒对于上帝审判的恐惧、对宽恕之盼望、对自由和财富之渴望的心理诉求,迎合听众的心理预期,引发听众共鸣,增强自己话语的劝说效果。

丁梅斯代尔用移情的方式,将自己的软弱与公众圣经教诲常常会衍生出负罪感、因惧怕而隐藏自己的过犯这些普遍情绪相勾连,使得自己忏悔更容易得到了听众的接受和同情。他的布道词反复强调人的局限性和神的无所不能性,强调来自上帝的拯救和希望而非罪罚和死亡。他将自己终将有勇气在公众面前袒露自己的罪归咎于“得到上帝的恩准”,是“上帝指引”自己来到众人面前,此举是在履行“他(上帝)在我眼前明白表示的意志”^[5]。丁梅斯代尔将自己的怯懦和虚伪归咎于是受了“魔鬼的力量”的挟持。从根本上说他隐匿自己的罪行的根源在于自己对社会权力地位的崇拜,一旦袒露罪行就意味着宗教社会地位的终结和崩塌。他在权贵、普通百姓面前袒露自己的罪行,表面上看来极具震撼力,但在一定层面上看,也是自己博取公众同情,获得大众的谅解手段。在他临终前,珠儿亲吻了他的嘴唇,象征着女儿与父亲最终的和解。这也表明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布道是成功的,他最终赢得了公众和女儿的尊重和谅解^[5]。

丁梅斯代尔的布道词符合清教徒肯定现实生活,积累财富,以追求富足生活作为敬拜神的方式,符合听众心理预期,从而提高自己布道的接受度。在小说中,霍桑赋予海斯特高超的刺绣手艺,成为“为官者炫耀权势不可或缺的东西”。^[6]可见,在波士顿定居的第一代移民中,清教思想盛行,宗教戒规森严,人们的思想以及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清教主义的禁锢。然而,人们极度渴望能冲破这些清规戒律,追求美和物质享受。清教徒本是为了反抗罗马教廷的腐败,才前往新大陆寻求宗教自由和人性解放。丁梅斯代尔的布道词符合公众的心理预期,自然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他的忏悔却被看作是谦卑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拥护和更高的地位,进一步加深自己的负罪感,表现了人物的矛盾心理和人性的复杂性。

情感诉诸肯定听众对所听到的内容的心理反映的重要性,言说者通过诉诸听话人的情感,达到增强说服力的目的。丁梅斯代尔善于把握众清教徒的宗教心理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渴望,所以他的布道极具感染力,直指人心,给听众以力量和安慰。霍桑通过对丁梅斯代尔这一自相矛盾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作家对人性之恶的洞察力、人性虚伪一面的细致观察以及对宗教公正性的质疑和反思。

4 逻辑诉诸说服效果

逻辑诉诸(logos)是指说服论证要符合逻辑,具备清晰的脉络,作为提高说服力效果的基础。在《红字》中,霍桑通过大量使用辞格、利用修辞三段论以及增强笔下人物说服力,同时体现不同人物的地位和性格。

在言说过程中说话人利用修辞格也可以增加自己话语的说服力。在小说中,为了让海斯特重新获得私生女珠儿(Pearl)的监护权,丁梅斯代尔正是通过反复以及反问这两种修辞格的使用突出母亲抚养女儿这一伦理诉求,进而说服清教官员,使海瑟特重获女儿的抚养权。在海斯特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丁梅斯代尔利用语句间隔重复法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凸显自己支持海斯特拥有抚养权的观点。“她(海斯特—作者注)说的话有道理……,海斯特说的话是有道理的”^[1]。通过重复“道理”这个词,使之成为整个句子的核心,丁梅斯代尔强调海斯特拥有女儿抚养权是“有道理的”,反之剥夺其抚养权则有违人伦。为了提高说服力效果,丁梅斯代尔强调母亲对于抚养自己孩子的本能是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并利用反问这一修辞法强调他的观点,“在这个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中难道就没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神圣品质吗?”^[2]通过反问,丁梅斯代尔给听者留出空间,让他们用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将自己尚未表达的意思弥补出来,即母亲和孩子之间存在神圣品质,一旦被剥夺是对神的亵渎。反问的方式既让听者人更容易接受自己观点,并且兼顾官员的面面,避免有被人冒犯之感。从这点看,丁梅斯代尔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家,深谙说话的艺术^[6]。

修辞三段论在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指的是“建立在或然性、迹象以及例证基础之上的,为了说服他人的三段论”。在小说第十七章,海斯特正是利用劝说三段论的原则,成功说服懦弱的丁梅斯代尔与她 and 珠儿一同离开波士顿,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首先,海斯特对牧师的劝说是建立在或然性的基础之上,即离开波士顿是为了追求真爱和幸福的神圣行为。她对丁梅斯代尔郑重地说道:“去一个依旧能得到幸福的地方!有海上宽阔的航道……明天充满了希望和成功。还有幸福等着你去享受!”^[3]再次,海斯特在自己的劝说过程中,突出二人的逃跑计划的迹象,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齐灵沃斯的不断试探,丁梅斯代尔身心饱受罪的折磨,濒临崩溃。海斯特一字一句地对牧师说道:“你不能再同这个人住在一起了,你的身心不能再留在他残忍目光!”^[4]所以,只有离开波士顿才能真正摆脱齐灵沃斯,才能保全性命。再加上齐灵沃斯“不会公开咱们的秘密”^[5],增加了逃跑计划顺利实施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海斯特向丁梅斯代尔保证,“不会让你一个人前进的^[3]!”自己和女儿的陪伴坚定了丁梅斯代尔离开波士顿的决心,为劝说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整个劝说过程中,海斯特

逻辑清楚,思维缜密,对逃跑计划态度坚决,彰显出海斯特沉着果敢,反抗宗教权威的女性主义形象,同时从侧面烘托丁梅斯代尔性格中怯懦的一面。

逻辑诉诸成败的关键取决于论证本身要具有清晰的逻辑性以及充分可靠的论证。丁梅斯代尔引用《圣经》经文无疑可以提高自己言辞的神圣性,不容他人怀疑反驳,流露出霍桑对清教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的批判。修辞格的使用可以加强说话人在劝说过程中的语气,强化劝说效果;而海斯特利用修辞三段论使自己的劝说更有逻辑性,提高自己说服力的同时展露出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

在《红字》中,霍桑将修辞三诉诸用于笔下人物塑造,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栩栩如生。丁梅斯代尔无疑是一位成功的言说者,他的正面形象,话语中丰富的修辞,将听话人置于一个合适的心态之中,引起听众的共鸣,有效提升自己布道以及言语的说服力效果,但是在他极具说服力的表象下隐藏着伪善、懦弱、狡猾的一面;齐灵沃斯处于宗教—权力地位的弱势地位的,加之外在形象的先天不足,他暗中刺探取证的行为也有其无奈的一面;海斯特面对宗教—男性权威,敢于打破清教束缚,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主义形象。霍桑笔下人物形象的多重意蕴映射出作家对于人性复杂性、清教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和专制的反思。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诉诸丰富了读者对《红字》中人物形象解读,洞察霍桑高超的艺术表达和人文思想高度。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
- [2] 甘柏兹.会话的策略[M].徐大明,高海洋译.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 Hawthorne, Nathaniel. The Scarlet Letter[M]. New York: Bantam Books,2003.
- [4] 邓志勇.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及范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5] 江莹.以修辞理论分析布道《永远的代祷者》中的说服力效果[J].海外英语,2014(19):224-26.
- [6] Erickson, Keith V. Aristotle: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Rhetoric[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薛璇子(1983-),女,中国陕西咸阳人,博士,讲师,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